

汉

当代汉语
语法研究

刁晏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汉语 语法研究

刁晏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汉语语法研究 / 刁晏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202 - 4

I. ①当… II. ①刁… III. ①现代汉语 - 语法 - 研究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52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笔者是学语法出身，早年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跟随许绍早先生学习近代汉语语法，所作的毕业论文题为《“把”字句的产生与演变》；后来在南开大学读博士时，跟随马庆株先生学习现代汉语语法，所作的毕业论文题为《虚义动词论》。经过这样两个阶段的学习，一方面打下了一定的汉语语法知识及语法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更培养了对语法的兴趣与爱好。后来，研究的范围虽然有所扩展，但语法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立足点，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

笔者自“出道”以来，已经出版的语法著作主要有以下一些：

《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近代汉语句法论稿》，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

《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三朝北盟会编〉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近些年来，笔者一直是在做“史”的研究，触角旁及，较多地涉及语法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是语法仍然是重点关注的对象。所以，笔者的其他一些著作，如《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5 年版）、《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现代汉语史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文革时期语言研究》（韩国岭南大学出版部 2011 年版）、《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虽然内容都限于语法，但是语法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是最

重要的内容。

著名语法学家邵敬敏先生在其所著《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中,曾经把笔者列入“新生代语法学家”,作为北京地区有代表性的学者加以介绍,算是对本人研究方向及点滴成绩的一个确认与肯定。

如果说笔者的语法研究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上边提到的“史”,即是在史的背景和框架下进行的。

笔者的语法研究所涉及的现象横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阶段。如果说,这一格局的形成最初主要是因为求学经历所致的话,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思考和实践,笔者对此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可以用“现代汉语史”和“汉语白话史”两个关键词来概括。

先说现代汉语史。2000年,我们正式提出了“现代汉语史”的概念(《论现代汉语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而早在此前的1992年,我们就提出应该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构想》,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总第36期),此后,笔者在语法以及其他方面做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纳入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就语法方面而言,就是围绕现代汉语史下位概念或研究领域的“现代汉语语法史”而进行的。在我们的构想和设计中,1919年以后的现代汉语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前景知识的话,那么此前漫长的近代汉语阶段则是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是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个背景知识,二者缺一不可。

再说汉语白话史。我们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最终目的有两个:一是作为一个独立阶段的研究,由此而建立一个现代汉语下的新的分支学科;二是以这一阶段的研究补上传统汉语史研究所缺的现代汉语这一段,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汉语史。谈到完整的汉语史,吕叔湘先生的一个观点非常重要。二十多年前,吕先生在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所作的序言中谈到,可以考虑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部分,即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我们认为,吕先生的这种汉语史划分设想大有深意,并曾就此做过一点讨论(刁晏斌《“文言史”刍议》,《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0年总第

七辑), 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则是我们所做的各项研究, 都是在为汉语白话史的建构而努力。

着眼于现代汉语, 我们对汉语白话史发展过程的认识, 简单地表述就是, 传统的古白话, 经过“欧化白话”这一桥梁, 最终发展演变为“今白话”, 即现代汉语。在汉语语言学界, 欧化白话虽然已是一个并非罕见的称谓形式,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它还所知甚少, 甚至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空白阶段, 并且对它在古白话与今白话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所以, 我们下一步的研究, 会以此为重要对象, 而首先切入的角度, 仍然是语法。在我们 2013 年竞标成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及研究”中, 有一个子课题为“清末民初语言研究”, 其研究的对象之一, 就是这一阶段的欧化白话。

话题由远及近, 下边就该说到当代汉语了。为什么要以当代汉语为研究对象? 对我们而言, 首先, 作为整个汉语白话史的末端和现代汉语史的一个阶段, 理应加以研究; 不过,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原因。陈望道先生曾经说过, 我们研究语文, 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 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 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 《陈望道语文论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于根元先生在充分肯定这一观点后进一步说道: “其实, 最根本的来源就在我们的屁股坐的地方: 中国的今天。”(《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4 页) 同书第 47 页又一次提到陈先生的这句话, 说: “可是, 最值得要和最必须有的东西正好在我们自己的屁股底下, 我们忽略了。”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 对一个汉语研究者来说, 这屁股底下, 当然首先就是当下的汉语,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汉语。当代汉语的各种语言事项及其发展变化丰富多彩, 堪称一个巨大的宝库, 有非常宏富的资源有待开发, 正因为如此, 它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也汇聚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但即使如此, 相对于它本身的复杂多样而言, 人们的研究还嫌不足, 在很多方面都犹有所待。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把本阶段的各种语言现象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

本书将与笔者早些时候出版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形成我们的当代汉语研究系列,并且这一系列还将继续扩充,比如我们已经着手进行的还有这一系列的第三本《当代汉语修辞研究》和第四本《当代汉语词汇探究》。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大致是“通论”,首先讨论了当代汉语的内涵,提出了两个我们认为对当代汉语语法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也是本书重要立论基础的问题,即当代汉语语法化和共时研究中的历时观照;接下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当代汉语语法及其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第二部分是“本体”研究,分别从词法和句法两个方面进行了举例性的研究,选取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现象,研究内容以共时描写为主,但也有一些历时的发掘,以及方法的探索和理论的思考。第三部分是当代汉语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两岸四地语法的比较研究。在我们构拟的现代汉语史中,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大陆普通话的发展史,另一条是以台湾“国语”为代表的普通话以外的汉语/“国语”/华语的发展史,二者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现代汉语史。所以,我们近些年来也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两岸四地、特别是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比较研究,最近更是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全球华语,其目的就是要理出第二条线索的共时状况和历时脉络。

生活还在继续,我们的研究也不会停止,将沿着上述方向不断前行。

作者

2015 年金秋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汉语语法及其研究	(1)
第一节 关于“当代汉语”	(1)
一、当代汉语概念的提出	(1)
二、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	(5)
三、当代汉语的起始时间	(14)
四、当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	(19)
五、当代汉语的语言观及其实现	(26)
第二节 当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问题	(31)
一、关于当代汉语语法化问题	(31)
二、关于共时语法研究中的历时观照问题	(38)
第三节 当代语法发展变化的宏观考察与分析	(49)
一、当代语法的宏观发展与变化	(50)
二、当代语法发展变化的两大价值取向	(59)
三、当代语法的发展变化脉络与走向	(63)
第四节 由三种语法现象研究看当代汉语语法研究	(69)
一、“程度副词+名词”研究	(69)
二、“动宾+宾”研究	(76)
三、“被××”研究	(83)
四、由上述三项研究看当代汉语语法研究	(87)
第二章 当代汉语词法研究	(98)
第一节 “程度副词+一般动词”形式	(98)
一、已有观点和相关用例	(99)
二、当代使用情况考察	(101)

三、“程度副词+一般动词”中的动词分析	(105)
四、小结及余论	(112)
第二节 “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	(114)
一、汉语中的“有+动(单)”形式	(114)
二、“有+动(单)”中“有”的功能和性质	(116)
三、“有+动(单)”的使用情况	(121)
四、“有+动(单)”的特点	(134)
第三节 不与动态助词共现的动词	(136)
0、引言	(136)
一、基于几部工具书的统计数据	(140)
二、不与动态助词共现动词的结构	(141)
三、不与动态助词共现动词的特点	(149)
四、由不与动态助词共现动词研究看语法研究	(155)
五、小结	(158)
第三章 当代汉语句法研究	(160)
第一节 “遭”字句	(161)
0、引言	(161)
一、“遭”字句与“被”字句比较	(162)
二、“遭”与“遭受/遭到/受”的比较	(183)
三、“遭”字句的历时考察	(198)
四、小结及余论	(208)
第二节 “获”字句	(216)
0、引言	(216)
一、“获”字句与“被”字句的异同	(217)
二、“获”字句的历时考察	(226)
三、被动句的分工与当代汉语的发展	(233)
第四章 两岸四地语法对比研究	(238)
第一节 从历时角度看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	(238)
一、由一篇论文说起	(239)
二、关联词语等的对比	(240)

三、结论	(245)
第二节 海峡两岸语法差异大纲	(245)
一、台湾“国语”语法概况	(246)
二、两岸实词方面的主要差异	(247)
三、两岸虚词方面的差异	(270)
四、两岸词组方面的差异	(297)
五、两岸句子方面的差异	(308)

第一章

当代汉语语法及其研究

与本书其他章节相比，本章比较“务虚”，主要对当代汉语以及当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主要围绕研究范围、主体面貌、基本的研究内容、应当注意的某些事项、总体的研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等来展开，试图帮助读者形成一个对当代汉语、当代汉语语法及其研究的相对完整的印象。

第一节 关于“当代汉语”

时至今日，“当代汉语”早已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了，但是，人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它进行过完整、准确的界定和表述，这就造成了许多模糊不清之处。比如，当代汉语的提出依据是什么，它的起始点在哪里，它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它的提出有无必要，它的提出给我们的汉语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以下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给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一、当代汉语概念的提出

时下，在汉语研究甚至某些一般使用的场合下，“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常见的指称形式。我们2013年4月19日在谷歌的学术搜索上以此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一共获得约55100条结果，其中除少数属于文学方面的使用（如“当代汉语写作、当代汉语散文”）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语言学范围内使用的，如“当代汉语新词语”

“当代汉语流行结构”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形式的使用数字还在增加,我们2015年9月10日在中国知网进行期刊全文检索,共得到138960条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有较高使用频率的常用学术用语了。

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汉语研究论文中,最早出现“当代汉语”的是刘丹青《当代汉语词典的词与非词问题》一文(《辞书研究》1987年第5期)。除标题中的“当代汉语词典”外,正文中还用到“当代汉语词汇”,原话是:“由于《现代汉语词典》等并未彻底解决当代汉语词汇中词与非词的问题,因此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如果孤立地看,这里的“当代汉语词典/词汇”是有歧义的:既可以是“当代—汉语词典/词汇”,也可以是“当代汉语—词典/词汇”,但是就文章内容看,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种“当代”与“汉语”共现但却没有直接组合关系的用例一直存在,比如周光庆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文章摘要的第二句是“当前的汉语词汇研究,最好能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走势,回到最为根本之处”;而正文的第一段也说:“在中国,在当代,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事业、为责任的学人,大都不会忘记……”显然,这里的“当代”就是“当前”,“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就是“当代的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

然而,有直接组合关系的“当代汉语”或许正是由最初的歧义而来。实际上,早在上述刘文后不久,就有人开始把“当代汉语”作为直接组合的指称形式使用,比如王希杰(1988)就说道:“在我们的当代汉语中,‘编剧+导演→编导’!‘编导’一词在‘编导演’之前早就产生了。”^①

至少到这里,一个新的指称形式“当代汉语”就产生了,并且此后这种用法不断有人跟进,用得也越来越多。比如,有些词典就以此为名,如刘继超等编《当代汉语新词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① 王希杰:《编导演》,《汉语学习》1988年第6期。

年版),安汝磐编《当代汉语实用词典》(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版)等。如果说这里的“当代汉语”或许还可能有歧义的话,那么许多论文标题以及正文对它却是作为一个独立语言片断使用的,因而也就只有一个意思。比如高怀志的《当代汉语的发展趋向》(《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年第1期),文章的摘要说:“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汉语的语音、语汇发生的变化,做出例证和理论的说明。”与此同时的另一篇论文,即姚汉铭的《新时期新词语研究述评》(《汉语学习》1993年第4期)也在摘要中说:“新时期的新词语,是当代汉语中一种突出的变异现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汉语研究者的注意。”

也就是说,至少在27年前(1988—2015)，“当代汉语”就开始在汉语研究中作为一个固定组合形式使用了。

然而,作为固定组合单位的“当代汉语”,在一段时间里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征询过主编《当代汉语词典》的已故著名语言学家金有景先生的看法,他说他用的“当代汉语”这一称名,大致就是指当今的汉语,也就是说,并不是在严格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使用这一名称的。笔者写过较多以当代汉语为题的论文,但是同样的所指也曾经用过“当今汉语”,如《当今汉语中极为活跃的“极端词语”》(《辽东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同样使用“当今汉语”的再如张丽芬《当今汉语修辞现象剖析——以2007年6月7日〈南方周末〉为据》(《现代语文》2008年第2期)、温敏《当今汉语通称与非通称语用研究》(内蒙古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标题之外,在行文中用到“当今汉语”的也时有所见,如“当今汉语中流行的‘酷’,显然用的是cool的引申义”。^①“当今汉语中使用的‘一×通’有两种情况:词组‘一×通’和三音词‘一×通’。”^②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人们一定是着眼于发展和变

① 宋金兰:《说“酷”》,《语文建设》2001年第4期。

② 于景超:《浅析三音词“一×通”》,《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

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和现代汉语“传统”形式的对比才使用当代汉语这一称名的,^①如郭伏良《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就目前所知,作为学术概念,即指称汉语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当代汉语”,是在1994年首次提出的。马孝义说:“本文拟提出‘当代汉语’这一名称,把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初期的汉语称为现代汉语,把从建国初期到当今的汉语称为当代汉语,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不同时期的汉语,而且也便于我们称说当今的汉语。”^②马氏提出当代汉语的缘由,主要是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教材给现代汉语所下的定义和所讲授的内容并不是从“五四”时期到当今所使用的汉语,而只是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至于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则不再讲授,即实际上讲授的是当代汉语而不是现代汉语。

这多少有些简单和偏执的理由,很快就招致反对,赵永大就此说道,认为当代汉语如果只是简单地从时间上说,指当今汉语的言语活动,祈望引起人们重视对当前话语实践的观察和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研究,那就另当别论,而把当代汉语作为语言的历史分期来使用,那就是站不住脚的。^③另外,赵文还从广义与狭义的角度对马文在“现代汉语”概念内涵理解上出现的偏差进行了分析与阐述,认为马文提出的“以50年代作为现、当代汉语的分界”理由并不充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也违背汉语历史分期的原则,这样,实际上就否认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当代汉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然而,差不多与马文同时,另一位学者也提议建立“当代汉语”这一概念,魏志成先是由中国文学界广泛使用“中国当代文学”这

①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② 马孝义:《“当代汉语”及其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③ 赵永大:《〈“当代汉语”及其特点〉质疑》,《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一概念来指称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文学, 国外语言教学与研究中诸如“最新日语”“当代英语”“当代美语”的概念也很常见, 而对人们不怎么使用“中国当代汉语”感到难以理解, 进而说道: “是否可以把 1949 年以后的汉语称之为‘当代汉语’? 我们觉得不仅有理由而且完全有必要这样去划分汉语史的断代; 如果坚持使用‘当代汉语’这一概念, 无疑是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与探讨的。”^① 魏文还简单说明了提出当代汉语的缘由和依据, 即我国的翻译著作有 90% 是近十年出版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出, 在翻译语言异常活跃的近十几年, 当代汉语的变化与发展必定十分突出”。^② 下边作为“粗浅的感受”谈到两点: 一是新词汇每日都在膨胀, 二是现代汉语中的欧化成分不仅日趋稳定, 而且愈演愈烈。

尽管最初关于当代汉语的讨论并不充分, 其中确实也有很多可议之处, 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使用作为学术概念的“当代汉语”, 或者说是接受了当代汉语这一分期。林有苗在接受“当代汉语”作为一个严格意义学术概念的基础上, 谈到其与现代汉语的划界问题, 文章认为, 如果说 20 世纪后 20 年为当代汉语形成的萌芽阶段, 那么进入 21 世纪它则已基本初具形态了。^③

二、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

关于当代汉语这一概念的产生基础, 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着眼点: 一是着眼于语言事实; 二是着眼于语言研究; 三是着眼于语言应用, 以下分别讨论。

(一) 着眼于语言事实

着眼于语言事实, 也就是基于对近百年来汉语发展变化事实的认知和把握。

① 魏志成:《翻译语言·当代汉语·翻译标准》,《鹭江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

② 同上。

③ 林有苗:《关于“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分期问题之思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不同的研究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做出了自己的阶段划分,比如,郭伏良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新词的产生情况对现代汉语史作了以下分期^①:

第一时期:1949—1965年;

第二时期:1966—1976年;

第三时期:1977年至今。

邵敬敏在为杨海明、周静《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谈到,现代汉语在近一百年里发生了三次急剧变化: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汉语(白话)从口语领域扩大到书面语领域,并且牢牢占领了这一阵地,这可以看作“文学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新文化语言”;第二次是1949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解放区语言为代表的新词新语新用法迅速替代了旧词旧语旧用法,这体现为“社会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了“革命式语言”;第三次则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飞速崛起,相应的语言面貌也发生了巨变,这体现为“经济革命”的成果,从而形成“开放式语言”。

以上两位的表述与我们对现代汉语史的分期完全一致:我们把1919年至今的现代汉语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在郭伏良三期的基础上再加上1919年至1949年的第一阶段;另外我们还认为,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也可以把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段合而为一,视为同一阶段中的两个下位分期,^②这样,实际上就与邵先生的划分完全一致了。

《湖北日报》2000年8月5日第2版“特别关注”栏目刊登一篇文章,肩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汉语。大量的新词诞生、外来语加入,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这是现代汉语发展的第一

^① 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②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次高峰。改革开放的中国，现代汉语开始了又一次强烈的碰撞。华中师大语言学家邢福义说，我们面临着——”接下来的正题则为“现代汉语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文中提到，邢福义教授认为，虽然这次汉语发展的激烈程度远非“五四”时期可比，但期间涌现出来的现象同样令人关注。新的词汇、新的词组、新的行文方式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包括主流媒体都无法避免使用。

何九盈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经历了五个阶段，其中第五阶段始于1979年，本阶段是语文地位提高、语文观念大开放的年代。^①

上述不同的分期或阶段划分，都基于同样的一个事实以及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受社会发展变化的拉动和牵引，现代汉语在其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们曾经作过以下的表述：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均速运动，而是如同河流一样，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时而狭窄曲折，时而急转直下。语言的发展变化同样也是如此：当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时，语言的发展也比较平稳，变化较小；当社会发生重大的变故时，随之也会拉动语言发生明显的，甚至是重大的变化。^②

上引各家的分期或相关的表述，其实正是着眼于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

那么，究竟是哪些重大变化，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现代汉语之外，再另立一个当代汉语呢？

马孝义说明了提出当代汉语的三点依据，即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确定与推广、汉语的规范化和汉语本身的发展变化。^③其实要说汉语本身的发展变化，最为明显和突出的无疑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① 何九盈：《汉语三论》，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② 刁晏斌：《论现代汉语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③ 马孝义：《“当代汉语”及其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